

William T. Rowe 著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漢口：一個中國都市內的衝突與共同體
， 1796—1895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梁 其 姿

中央研究院 中山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所

羅威廉教授在1984年出版了第一本關於漢口的書⁽¹⁾，這本書主要論及漢口在1796年到1889年間的貿易與社會，尤以貿易及商業會館組織為主，頗受好評。五年後，寫作極其勤奮的羅教授又發表了他第二本有關漢口的專著，這次的重點則在社會學上的分析，在內容組織上，比前書更為精細；全書由四大部分所組成，分別為都市（市民及都市空間的背景分析）、共同體（由當地社會精英組織的社會福利及公共事業所維繫的社團及其意識）、社會衝突（社會低下階層、游民、秘密會社分子所引發的社會衝突及其解決方式）、治安控制（官僚體制所支配的武力及地方武力的組織，以及1883年危機所帶動的雙方武力合作）。全書正文部份三百五十多頁，結合了極其細緻的事件描述，以及相當重要

1. W.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436p. (此書國內南天書局1987年重印)

的理論探討，是十九世紀中國社會史，尤其都市社會史的精采之作。

羅教授的兩本書均從中央官僚制度式微的嘉慶時代開始，不過第二本書涵蓋時間比第一本長，包括了張之洞任湖廣總督之首六年；他之所以延長時限，主要目的在針對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事件（如1890年代的工人罷工）作重要社會分析。但是與第一冊一樣，第二本書仍對張之洞及他後來在湖廣地區所執行的新政，不加以探討。換言之，羅威廉所感興趣的漢口，是中央勢力較為薄弱的漢口，這個特點，在這第二本著作中，尤為明顯。作者所要強調的，是十九世紀漢口市社會的自主性格。

作者根據大量性質不同的第一手資料（方志、故宮檔案、英美外交檔、總理衙門檔、外國教會檔案、海關檔、當時中外報章、傳教士回憶錄以及各種文集等）以整理出極為仔細具體的大小事件，令人敬佩不已。除此之外，筆者認為本書的主要貢獻在釐清以下三點：紳商階層在漢口社會的公共範圍（public sphere）所扮演的主導性角色；社會衝突在都市共同體意識構成過程中的重要性；與同期的西方都市社會（如L. Chevalier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比較之下漢口市所具的「近代性」。

在論及十九世紀都市的紳商活動，及太平天國平定後公共範圍的擴大兩方面，作者明顯地受到 K. Schoppa 與 Mary Rankin⁽²⁾的影響，但有更進一步的申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有關近代中國的公共範圍論文中⁽³⁾，羅威廉對這個觀念仍有發揮。他所謂「公」，即處於「官」與「私」之間的範圍⁽⁴⁾，主要即紳商階層主要活動及產生影響力的範圍。作者在本書重心的第二部分（「共同體」）中以相當大的篇幅描述了紳商在此範圍中的主要

活動，即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前者如經營育嬰、養老、惜字、清潔、義學及社倉等慈善機構，後者如資助築路建橋、水利、防火、義渡、建廟等，這些活動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更重要的是羅威廉認為這些紳商所控制的公共福利及建設活動範圍，在太平天國之亂後積極地擴大，而且與以前的活動有性質上的不同：他以「善堂」制度來總括十九世紀後期的福利活動，認為原有的育嬰堂普濟堂等機構，雖在亂後亦有重建，但性質是懷舊的，而新的善堂則是面對未來的，它們反官僚、反映著新的紳商結合，主宰漢口在亂後的社會重建工作。羅威廉甚至認為善堂是十九世紀都市社會的最具關鍵性機構（頁126）。至於公共建設方面，由於「八大行」的積極介入，亦在亂後有長足發展。羅威廉認為這個公共範圍的擴張主要起自在太平天國亂後，及至張之洞成為湖廣總督，實施新政始告稍息。

公共範圍的發展，直接地增長了地方精英紳商的勢力，這點在地方自衛及武力建設方面表現得至為明顯；漢口市民在他們的

2. Mary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27p. R.K.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書中羅威亦多次引用 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一書中關於都市謀求社會共識之過程討論部份。

3. W.T.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6: 3 (July 1990), 頁 309-329.

4. 有關「公」與「私」的概念，他引用了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看法，溝口氏有關之近作可參看「中國の「公・私」」上、下（《文學》9-10: 56, 1988, 岩波書店）一文。

領導下自力在 1864 年建了城牆，同期團練的發展及後來保甲制度的改革也都主要由這些精英分子發動。地方武力的擴大自然地加強了漢口社會的自主性，這個自主性背後是強大的凝聚力，面對危機時，能夠產生強大的團結與動員力量。漢口市民以有系統的動員粉碎了 1883 年白蓮教的全國性大規模造反計劃，即充份地說明了漢口社會不尋常的凝聚力。雖然這次總動員是漢口社會與官僚制度合作的結果，但在紳商領導下的都市社會的主動性已成為事件的決定性因素。

同時，這個時期漢口社會的階級衝突比同期的西方都市社會較為緩和。羅威廉認為這種較強的社會共識（consensus）是從解決各種衝突的協調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社團間之衝突或透過團體之間不斷的妥協而化解，或經由儀式慶典（如書中所舉龍舟競賽儀式的例子）的舉行而得到某種程度的淨化，又或經過中間人（主要仍是紳商分子）的說情而得到和解。有關這點，作者引用了社會理論家 Simmel 及 Lewis Coser 等人的說法，即社會衝突其實是社團間互賴合作的先決條件，一個多元及複雜（heterogeneous）的社會必然滋生不同社團間之矛盾，而社會共識必須建立在這些矛盾的化解之上，換言之，社團間的冷漠——而非衝突——才是共識的最大阻礙。當然，如果這些衝突尖銳到無法以協調方式解決的話，社會共識亦同樣無法達到；不過羅威廉筆下的漢口市在新政實施及現代工業化之前（即 1890 年代以前），並沒有這類尖銳的階級衝突，而是一個健康的、以多種和平手段解決社會矛盾的多元化都會。但作者強調，中央官僚系統對解決漢口的社會糾紛並沒有任何貢獻。貢獻最大的反而是地方商業會館及小社區（subcommunity）的組合。於此，他借用了今堀誠二的「共同體」概念，及楊慶

堃的中國傳統社區結構觀念來說明他的看法。

十九世紀漢口市的這個特色，是作者認為與同期西方都會最為不同的一點。在其他方面，人口快速增加的漢口（1890 年約一百萬人）仍然與近代西方城市有許多類似的方面。在都市空間分佈方面，新舊移民聚居在同一區域，而不外散至近郊；商業區也與行政區分家。社會階層的結構，亦因人口流動快速而日趨複雜；漢口市民也與西方大都會市民一樣，對其所居地有認同感，而且因為長期以來目睹各省移民及外國人的移入，對非本土人有很大的包容性，排外情緒並不強烈（作者指出 1883 年以前並沒有任何自發性的反西人事件）。不過同時漢口人與西方市民一樣，心目中也有所謂「市民」及「外來人」（outsiders）的區別，後者（如痞棍、無業游民、會黨分子等可能破壞社會安定的邊緣人）基本上不符合漢口人對良民奉公守法的起碼要求。因此，在許多方面，十九世紀的漢口乃是典型的從傳統家庭經濟往資本主義過渡的近代城市。

很明顯地，作者對他的研究對象——新政及工業化前的漢口市——有相當的感情和喜愛。此時的漢口市雖然已成人口稠密的國際都會，龍蛇混雜，但是經過不同社會渠道的疏導，各階層及社團尚能和諧共處，並且在財強勢大的紳商精英領導下，使社會組織日以進步，並促進經濟穩定，所以一直至 1883 年的白蓮教造反，漢口地區所經歷的大小動亂都不是因為該市出了社會或經濟問題，而是外來因素的觸發。作者顯然確信中央勢力的減弱，以及由精英紳商（尤其以商業會館為代表的勢力）所主宰的公共範圍的相對擴張是此時期漢口穩定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後者基本上來自中國傳統社會本身的動力。但這個社會平衡，在張之洞在兩湖地區實施新政之後，受到無可挽救的破壞。一方面，以追求西化進

步自居的社會精英漸視官僚體制為阻礙進步的障礙，另一方面，一般百姓則覺得他們為所謂新政付出的代價太大，清廷成為眾矢之的，地方勢力與官僚傳統的合作遂變為絕響。這個經驗當然不限於漢口市，也見於中國其他西方化的城市，而且最後激發了國家層次的革命。羅威廉的這本書就停止在中國傳統社會秩序完全崩潰之前夕。

* * *

雖然歷史著作最終目標不外乎呈現過去人類社會的面貌，但是所有歷史寫作都不免受作者所處時代主導思想的影響，因此對相同的歷史問題，不同時代的史學家有迥然不同的看法與解釋。如果我們拿長一輩的蘇雲峰先生所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⁵⁾與少壯派的羅威廉所著二書相比，即可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蘇書的重點放在張之洞督鄂以後，認為湖北的現代化真正開始於此時，羅書以張的來鄂作為結束，認為此乃漢口原有協調的社會秩序崩壞的前奏；蘇書以極肯定的態度來描述當時以西化（引入西式政治制度與科技發明）為主的新政，認為這些改革為湖北帶來長足的進步，而羅書則對此抱懷疑的態度，認為這些政策其實破壞了原有的社會共同體意識，反而減低了傳統社會逐漸步向資本主義化的可能性；同樣地，蘇書對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體有無限的嚮往，張之洞是這個政體的代表；羅書則重視地方紳商精英的角色，對他們所主宰的、有相當自主性格（相對於官僚體系而言）的公共範圍抱肯定的態度，而懷疑後來「過於有為」（interventionist）的中央的真正效率。蘇書在再版自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1），1981年初版，1987年修訂版。

序中提及羅威廉在1983年對其書所作的批評，認為羅的意見「係受到當時興起的左傾批判意識及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所致」⁽⁶⁾；蘇雲峰的觀察大體正確。不過這並不表示他本人的觀點比較中立，他對現代化的肯定所根據的理論主要引自美國學者C. Black於1966年出版的書⁽⁷⁾。當時東西方冷戰方興未艾，美國對其政治及科技之進步性仍深信不疑，可說還活在一個樂觀的後期啓蒙時代，蘇書是這個啓蒙時代的典型歷史作品。羅威廉的作品則寫於80年代，此時西方對本身發展模式的堅定信心已搖動，反而重新肯定其他文化的特點。在這點上，他的作品也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主流思想。總之，兩書都是寫於不同時代而具代表性的歷史著作。

從這個脈絡看羅書可能會較易了解本書的特色和意義。作者努力從中國傳統都會結構中找尋近代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結果他找到一些可與同期西方相提並論的現象，如公共範圍的擴張⁽⁸⁾（暗示著一個公民社會的逐漸茁壯）、充滿韌力及開放性、包容性的社會階層結構，以及政府與社會互賴與融洽的關係。此外，十九世紀的漢口社會還有同期西方都會所沒有的和諧性。從肯定中國傳統都市社會有潛力以和平漸進方式向類似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羅威廉自然懷疑激進的西化新政對中國發展的真正效益。在他看來，過急的西化政策是為了表面的所謂進步而犧牲了社會的和諧與自

6. 同上，1987年版，再版自序，頁一。

7. C.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6.

8. 註三論文有更清楚的說明，羅氏以Habermas最新英譯著作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89) 作為主要比較的出發點。

主，得不償失。他似乎暗示讀者，中國社會往後半個多世紀的動蕩分裂，與過份迷信「大有為政府」及西方政體的這種新政情結有密切關係，而如 Rankin 所言，這個情結表現在清末以後的政治上，最後就是共產政權以完全異於傳統的強大中央專制制度統一全國⁹，為此中國社會付出了空前巨大的代價。

這書既有如此重要的含意，內容止於張之洞新政實施之前實是一大遺憾。究竟具體上，激進的西化政策如何破壞了原有社會溝通的渠道？地方紳商精英如何從依賴及支持清政府，到以民族主義口實來反對同一政權（除了如 Rankin 所認為的甲午戰爭的失敗外，其他社會分析的解釋是否可能），以至完全結束數百年來兩者相互合作的局面？這些問題均只有在新政對社會結構影響得到仔細剖析後，始能獲得到答案。否則，作者似乎有誇大新政的反面作用之嫌，而相對地可能低估了太平天國之亂的破壞性。另一方面，作者認為公共範圍在太平天國之亂前後均有發展，但在亂後的發展有基本上的質變，筆者並不以為然。紳商擔負起地方社會福利及公共設施責任，其習性由來已久，而有組織的行動，至遲在明末江南即已可見，在清初中央勢力較強盛時，仍有明顯的擴張，到了乾嘉之際，又有新的分散式發展（decentralization），因此如其說太平亂後是此一範圍之嶄新發展時期，寧可說是一種長期發展的伸延。這個歷史過程的釐清，對了解書中所強調的公共範圍的性質是比較重要的。

近百年來中國的厄運、強勢西方文明的支配世界已長期地擾亂了我們對傳統中國社會的認識。今天論者又往往將解放中的東

歐與仍在政治高壓之下的中國大陸相比，所謂市民社會的發展頓時成為時髦的討論課題。於此當時，我們實應重新踏實地、誠懇地面對中國的社會史。因此，羅威廉的這本分析近代漢口社會之力作，不單是有關學者必讀之書，也是所有關心當代中國命運的人應仔細研讀的重要著作。

9. 見註二，Rankin 書，頁 308-9。